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5 期（总第 353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9 年 5 月 5 日

-
- ◆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韩长赋(1)
 - ◆ 在农村改革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郭书田(5)
 - ◆ 精准扶贫是人类史上的一场伟大试验.....刘守英(8)
 - ◆ 坚持以战略思维谋划推进乡村振兴.....陈文胜(10)
 - ◆ 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部.....朱丕荣(13)
 - ◆ 乡村振兴是历史的必然.....陈锡文(16)
 - ◆ 求田舍地置地产.....景志刚(20)
 - ◆ 小岗的三种颜色.....李朝民(23)
 - ◆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的丹阳路径.....张旭红 潘玉华(26)
 - ◆ 我国对籽粒苋草产业的创新开发与国外对苋研发的新动态.....孙鸿良 岳绍先(28)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韩长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出了原则要求,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了系统全面部署, 硬化实化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安排。今年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 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 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要认真学习领会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 采取超常规的政策举措, 加快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一、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历史性地把农业农村工作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优先位置; 在 2017 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 提出了“四个优先”的明确要求; 在 2018 年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提振了信心,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党的“三农”理论的创新发展。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都始终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三农”问题, 引领推动党的事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先后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论断, 坚持不懈地对科学处理工农城乡关系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提出并深刻阐释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一总方针, 进一步明确了对工农城乡发展优先序的战略考量, 强化了对农业农村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导向,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顺应了城乡演变和现代化建设规律, 抓住了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 是对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是我们党关于工农城乡关系问题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 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体现了鲜明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分阶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战略安排, 这是包括“三农”发展在内的国家整体战略。我国拥有 13 亿多人口、近 6 亿人生活在农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 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裕、没有农民安居乐业, 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稳固的。即使将来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70%, 仍将有 4 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农民落在现代化进程

之后，既不符合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当前，农业依然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依然是全面小康的短板。不把农业农村发展摆上优先位置，拿出过硬办法，就无法补齐这个短腿短板，确保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重塑我国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过去，我们靠工农产品价格和城乡要素“剪刀差”支撑了大规模城镇化和快速工业化。现在，城市对农村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的“虹吸”效应仍在持续。如果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是要消除绝对贫困，那么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就是要缩小城乡差别，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1万美元，城市常住人口比重已接近60%，到了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阶段。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是要扭转长期以来“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思维定势，建立起向农村倾斜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已经具备条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粮食总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617元，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全面改善，为加快实现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年，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都取得长足进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财政增加投入的能力和条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为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城乡经济和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村日益成为稀缺资源，越来越多城里人向往田园风光，乐于望山看水忆乡愁，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成为可能。在这个关键时候，中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符合发展阶段，符合国情农情，恰逢其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有亿万农民的创造精神，完全有条件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二、准确把握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内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要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这为我们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划出了重点、明确了方向。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要切实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把“四个优先”要求落到具体制度设计、政策制定、财政投入和工作重点摆布上，建立健全与优先发展相配套的工作推动机制和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全面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三农”事业需要。中央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要懂“三农”工作、会抓“三农”工作，分管领导要真正成为“三农”工作的行家里手。从目前情况看，“三农”工作的领导和推进机制、“三农”干部队伍和不少农村基层党组织还不能很好适应这一要求。一些地方对党管农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淡化，实际工作中“三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不少干部对农业农村情况不够了解，和农民聊得来、说农民听得懂的话还不多；甚至部分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侵犯农民利益的“微腐败”时有发生。针对这些问题，要认真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要求，建立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考核制度，压实市县两级的责任，特别是推动县委书记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工

作上，当好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要把到农村一线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将优秀干部充实到“三农”战线和基层一线，抓实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

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体制机制，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近年来，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渠道还没有完全打通，要素不平等交换问题还比较突出，农村人才、资金和土地还在大量流入城市，农业农村“失血”问题仍很严重。比如，搞城市建设主要征占农村土地，但全国土地出让收益支出中用于农业农村的比重还不到30%，“取之于农、用之于城”问题突出；每年新增1600万农村劳动力进城，大量有文化的年轻人持续外流，老一辈农民逐渐退出，“谁来种地、谁来兴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村金融主体供给不足，产品供给单一，农民特别是新型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强化制度性供给和政策安排设计，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改变资源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格局，构建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享共赢的互利互惠机制，让土地、人才、资金、技术、科技等各类发展要素更多流向农业农村。

加大公共财政倾斜支持力度，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将优先发展真正落到实处，补上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多年的欠账，急需大量真金白银的投入。农业农村建设面广量大，很多项目都是公益性的，社会效益明显高于经济效益，少数有回报的也是投入大、周期长、回本慢，必须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主渠道作用。据粗略测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完成农村厕所、生活垃圾和污水专项整治“三大革命”，需要建设资金超过3万亿元。我国大多数县乡财政都是“吃饭”财政，村集体经济家底普遍较薄，甚至还有不少零收入的空壳村。仅仅靠农村农民自身的力量，靠现有资金筹集渠道、投入力度，远远满足不了农业农村发展需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三农”的资金项目，很多还是“撒芝麻盐”，钱不能拢起来用，解决不了大问题。为此，要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和金融优先服务领域，加大公共财政倾斜力度，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不断增加。同时，加快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金配置到农业农村。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城乡差距大，最直观、农民反映最强烈的，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的落差。这既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优先补齐的突出短板，也是影响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主要痛点。近年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明显改善，但与城镇相比，仍是两套标准、两个天地。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约1/3的行政村村内道路没有硬化，近1/3的村生活垃圾没有集中收集处理，超过80%的村生活污水未得到集中处理，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的农户比例不到一半，不少村庄还没有连上4G网络和宽带光纤，农民看病、子女入托上学还有不少难处，因病致贫现象仍大量存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公共服务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持续改善路、水、电、物流等基础条件，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全面提升农村科教文卫体、养老社保等公共服务水平，努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让农民在农村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日子。

三、坚持不懈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落到实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历史交汇期。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集中力量补短板、强弱项，如期完成“三农”领域硬任务，稳住“三农”这个战略后院，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大倾斜支持力度，落实各方责任，在组织领导、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干部配备、督导考核等方

面动真格、见实效，巩固发展“三农”持续向好形势，为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三农”问题历来是关系到固本安民的要害问题，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着力健全各级党委全面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不断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快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把加强党的领导、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党内法规形式确定下来。尽快制定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实施细则，把“四个优先”落实情况列入乡村振兴工作年度报告、市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对各级党委政府的硬约束。按照关爱干部、激励干部的新要求，完善“三农”干部培育、配备、管理、使用机制，着力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

抓紧抓实“三农”领域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对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落实到“三农”改革发展工作中，集中力量抓紧抓实打赢脱贫攻坚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证农民收入翻番、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到2020年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坚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中之重、急中之急，重点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存在的短板问题，加大向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人口倾斜支持力度，下大力气抓好产业扶贫，建立健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机制办法。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要千方百计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在2018年水平上，统筹抓好其他重要农产品供给。紧紧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把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往深里做、往细里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乡村旅游、“互联网+”等新产业新业态，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入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大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厕所革命和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施村庄清洁行动，提升村容村貌，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统筹抓好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文明乡风等任务。

建立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强“三农”问题研究，创设出台一批含金量高的重大政策。要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藩篱，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研究制定完善农业支持保护的意见，按照增加总量、优化存量、提高效能的原则，构建新型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健全完善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积极参与的农业农村发展多元投入格局，加大金融支农力度，落实县域新增贷款主要用于乡村振兴政策，完善农业保险政策，引导工商资本投向乡村振兴。强化乡村振兴法治保障，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农业综合执法，推动依法兴农、依法护农。

抓紧谋划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既要靠外部倾斜投入，也要靠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必须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等各方面改革。要全面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完善落实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研究提出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配套政策。完善农村土地征收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配套制度，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完成清产核资任务，探索新型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完善“农户+合作社”、订单农业等利益联结机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作者：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来源：《求是》，2019年04月01日）

在农村改革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

郭书田

在农村改革 40 年中，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哲学问题。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存在“左”与右的两种思想的斗争。从苏联十月革命产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苏联为首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虽然依靠执政的优势，使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如“卫星上天”等，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差距甚大，原因在于犯了“左”的教条主义的错误。1991 年，有 74 年历史的苏联 16 个加盟共和国解体，有 7 个东欧国家与南斯拉夫 6 个加盟共和国巨变，共产党变为在野党，失去了执政地位。造成这个悲剧，虽然有一定的外国“颜色革命”的影响，而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窒息民主的政治制度与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三次“左”的错误，使苏区革命损失了 90%，白区革命损失了 100%。而毛泽东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个胜利也可以说是反对“左”的教条主义的胜利。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在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失误中，也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改变“两个凡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农村为突破口，带动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这个成就实际上是纠正“左”的教条主义错误的成就。

在农村改革中，农民创造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冒着风险冲破“左”的禁区取得的，还受到种种非议与斥责，来之不易。如土地的包干到户（家庭经营），使持续 20 年之久的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农民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解放了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这项改革为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这是农村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但在国内有人认为，这是“分田单干”，就是资本主义，是方向道路问题，提出要重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又如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在中国是率先走向了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创造了新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这项改革为一位外国元首誉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武器”（原子弹）。而在国内有人斥之为“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不正之风的风源”。再如为了生存，不当“世袭农民”，冲破户口限制，自带口粮，在十分艰辛的情况下，进城务工经商，增加家庭收入，成为城市建设与服务的主力军，而有人把他们斥之为“盲流”，破坏城市社会秩序。2008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有 2000 多万农民工返乡，未影响社会安定，美国《时代》杂志在封面刊载——向背井离乡的中国工人（农民工）的贡献致

敬。再如，农民了争取应有的政治地位，创造了村民自治组织，实行四大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受到农民极大欢迎。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亲自观察江苏一个村的村民选举全过程后说，农民找到了真正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诀窍。但国内有人认为农民没文化，文盲多，实行民主选举是空想，予以反对。还有农民创造的股份合作制，获得了土地等集体资产的财产权，农民成为既是社员又是股东，增加财产性收入，受到农民欢迎，但有人反对，认为是不伦不类，非驴非马，把股权落实到户是“私有化”等等，不胜枚举。由此看出，在“左”的教条主义与既得利益凝结在一起的习惯势力是多么坚固，改革起来又有多么艰难。这种“左”的势力，已成为改革的阻力，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还会不断出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放思想，排除干扰，仍是重大的历史使命。

在农村改革中出现的诸多事物，应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真加以反思，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利更好前进，十分必要。

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变“左”的错误重大转折。但在追求经济两位数高速增长中，付出了损害生态环境的极大代价。宣传粮食“十二连增”的成绩，回避了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与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大问题。中国耕地面积占世界的9%，使用化肥却占到30%—40%，利用率只有30%，不仅污染环境还增加成本，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导致大量进口。农业部宣布2017年提前实现化肥与农药零增长目标，而存量数量仍然很大，还需要下大力解决。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最早提出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发生矛盾时，应坚持前者服从后者的原则，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遗憾的是这一重要观点未能很好贯彻，需要在建设生态文明中加大力度来改变。

二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过程中，不但未能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且还出现了农业副业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问题。城市化不是以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为代价。进城的农民工未能市民化，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土地、劳力、资本三要素由农村流向城市，拉大了城乡差别。在指导思想，存在重城轻乡、重工轻农问题，这是要害。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早在1954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详见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发行）中提出，工业化包括农业与工业两方面机械化的现代化（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理论。我国工业化的实践与此相反，农业滞后于工业，农村滞后于城市，农村人口大量滞留在农村，成为“世袭农民”。改革开放后，青壮年农民进城打工，由于户口的限制，在《宪法》中取消了迁徙自由，成为“两栖农民”，农村出现老人、妇女、儿童三大留守群体，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最大的难点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举措，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根深蒂固，还需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与均等化。

三是在农村改革中，农民不仅争取获得经济权利，还要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农民创造的村民自治，开创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有了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组织。但在实践中变了形，走了样，成为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行使部分政府职能。有些地方把土地等集体资产的管理权由村民委员会承担，党的基层组织成为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者，造成新的党政不分，政社不分段局面，重蹈人民公社的覆辙。有的村为

村干部家族势力所控制，成为“小官巨腐”的阵地，引起农民强烈的不满。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农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重要内容，也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一问题需要在深化农村基层组织改革中加以解决。

回顾农村改革的历史，使我们深刻地感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取得重大成就，创造奇迹。反之，违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形而上学泛滥，就会遭受失误和挫折，虽在危害极其严重时被迫矫正民主，而付出及其沉重的代价。特别恶劣的是唱高调，以马克思的只言片语，作为压制不同意见的棍子窒息了民主。这种历史不应重演。我们要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局面，善于听取“逆耳忠言”，出现一批当代的魏征。

农村的巨大变化说明，关键在于解放思想，端正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认识，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在中国党内流传着几句不成文的话：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其危害性极大。马克思是伟人，不是神仙；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即是圣贤也不会无过。中国有句古语，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悛。马克思的伟大，不仅是他创造的理论光辉不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而且能够与恩格斯一起，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正一些不合实际的论断与主张，这是伟人的高贵品德，是最值得学习的，勇于解剖自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马克思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的内涵，是在未来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首次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及后来提出的“民主、科学”，既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帝制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类共同的理想。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国伟大思想家孔子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直到近代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倡导“天下为公”，实行“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与“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住”的主张，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明年是“五四”100 周年，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激励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解放全人类，必须首先解放自己。执政党的党员，从上到下只能不折不扣地当好人民的公仆，不能有任何丝毫的特权，否则就会变质，为人民唾弃，成为历史罪人。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在中国实现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命运共同体，把解放思想作为改革开放不息的前提条件。改革也可以说是一场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为准则的自我革命，是检验共产党人政治立场的试金石，改革永远在路上不会停止。改革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应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持改革不停步，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光彩而努力奋斗。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2018 年 7 月 20 日）

精准扶贫是人类史上的一场伟大试验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刘守英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以精准扶贫作为今年季度报告主题，很有意义。我给出三点评价。

第一，此次主题报告的影响可以存入历史。中国的精准扶贫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反贫战争中投入最大、参与人数最多，但议论也最多、后期影响更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事件，是人类史上的一场伟大的试验。这件事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这个研究才刚刚开始。此次宏观经济论坛的主题报告是对中国中部一个县如何实施精准扶贫的全过程的真实记录，也取得了基于经济学分析的阶段性成果，具有一定的文献和历史价值，越往后看这一研究的价值越大。

第二，这份主题报告给出了此次精准扶贫的独特价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扶贫是制度改革的减贫，通过改革开放权利，使一些被体制束缚的农民从贫困陷阱里跑出来。第二个阶段是区域扶贫战略。在第一波没有摆脱贫困的人，不能说简单地说是扶贫工作不到位，更不能怪老百姓不努力。我们到这些地方去，老百姓反映，村里也琢磨了各种产业，比如看人家种板栗，自己也种，但是第二年什么都种不出来，这种例子在90年代大量发生。原因在于硬基础设施的阻隔。在第二波反贫困中，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区域性扶贫战略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打通了老百姓与外面沟通的渠道，很多受环境阻隔的贫困人口走出去，并把外面的信息带进去，同时缓解了当地人跟自然之间的恶化状态；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一波的精准扶贫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各种力量，通过特殊的安排，让最后一批贫困人口进入小康。这份主题报告非常“精准”地呈现了一个县的精准扶贫是如何实施的，澄清了许多关于精准扶贫是否必要的非议。同时这份报告还有以下两个增量，一是此轮精准扶贫实施中，发觉了我们在乡村政策上的大量空白和缺失，仍然存在大量制度和政策性障碍，导致不该贫困的人还处于贫困状况；二是中国这套体制安排的独特性，这份报告细致描述了精准扶贫中，只要上下动真格做一件事的时候，自上而下由一个指挥棒带领大家脱贫，其效力无与伦比。这点只有中国做得到，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得到。同时，有些做过的地方也与这一体制特征有关。

第三，报告中的一些客观分析值得称道。一是关于贫困人口识别的问题。很多人对此是怀疑的，但从新

县的情况来看，只要假定动真格，是能够做到的。难就难在是否真干。二在精准扶贫中，乡村劳动力的利用十分重要。报告在很多方面都给出了非常深入的分析。

接下来，我就反贫问题谈一下自己的几个看法。

第一，贫困户贫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些贫困户很难带动，我在一次云南的调研中，跟一些贫困户去聊，问他到底缺什么？政府做的怎么样？那个贫困户就翘着二郎腿听着地方小调，也不说什么。还有一次在毕节调研时，有个负责帮扶的人跟我讲，他负责三户，其中有一户很难带动，有一次下雨，帮扶对象打电话给他说明屋子漏雨了，床被漏湿了。他立马赶过去，发现是他自己把床移到漏雨的地方。这些案例反映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去反思的。有些贫困户为什么会这样，需要好好思考。我们经常讲穷则思变，但是人由于各种挫折，可能会导致他对所有的东西都麻木。我们对穷人加以干预的时候可能需要想得更深一点，现在很多的干预措施还是偏表面、偏外在。

第二，扶贫政策的连续性需要深入研究。我们不要指望一个政策、一个阶段就能解决贫困这样一个人类未解决的难题。尤其最后剩下的一批贫困人口，往往不是简单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可能是因为孩子上学，可能是因为经济活动的挫折，甚至可能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导致最后这批人的贫困。所以，反贫政策一定要有连续性。这次精准扶贫在总体上通过攻坚，可以将贫困群体往上拉一个台阶。但是，这些人要真正持久性地摆脱贫困，既需要想法激发和培育贫者的内生动力，也需要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第三，关于贫困地区的产业问题需要更针对性的研究。中国乡村的危机往往是由于整个乡村各种结构的有机配合被破坏导致的，最后使农民完全只依赖于农业这一根稻草。很多地方搞产业扶贫，但没有好好琢磨在如此贫困的地区产业如何长出来。产业扶贫出了非常多的荒唐事，比如有些地方养羊、养奶牛等，最后发现并不是真正的养，而是为了联手套取扶贫资金。从我们的调查来看，乡村产业的复杂度如果不提高，仅仅靠简单的农业经济活动，还是很难富裕起来的，需要加大农村产业的复杂性的深入研究，比如产业到底怎么形成？怎么提高它的复杂度？需要有对这些问题的充分认识，才有可能把贫困地区的产业真正做起来。

第四，精准扶贫的特殊群体值得关注。对于最后剩下的这批贫困户，精准扶贫予以了充分关注。但是，贫困地区农民的分化问题需要细致研究。这一轮的精准扶贫的进步是精准到户，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特殊群体，目前和今后已经露头的特殊群体就是乡村里的老人。这些老人原来在农村务农，也出不去，之后他的孩子和孙子出去了，这就导致整个乡村的老人在不能动以后感到极度绝望，这也是未来贫困研究和进一步的反贫中非常需要关注的对象。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19年3月16日）

坚持以战略思维谋划推进乡村振兴

陈文胜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从此成为了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加快推进，党中央不断提出了相应的目标和要求。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不仅是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更是在中国现代化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为警惕“黑天鹅”事件，防范“灰犀牛”事件，突出地强调了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必须坚持的战略思维。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粮食安全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因为能否把中国人的饭碗稳稳地端在自己的手上，无疑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底线。作为人多地少的全球人口大国，即使中国再富裕强大，有再多的钱也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买回能够养活十四亿多人口的粮食，“谁来养活中国”始终是悬挂中华民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悬剑”。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2018年，中国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下降，2018年去库存的进度快于预期，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农业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后院，经济形势越复杂就越要稳住三农基本盘，越需要农业作为安天下的产业发挥着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农业是一个基本盘，基本盘稳定了，其他就全面稳定了。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中国只要自己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都好说。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突出一个“稳”字，换一句话来说就是防范风险。

乡村振兴，产业为本。最关键的是产业兴旺，最核心的是农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偏低。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因此，必须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品牌战略引领产业优化，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农村改革激活产业活力，以社会化服务补齐产业短板，优化农业资源要素配置，调特产品结构，调绿生产方式，调优产业结构，构建从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的农业政策体系，使农业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美好产业。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乡村振兴“要树牢绿色发展理念”。乡村振兴，绿色为要。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乡村才会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农村基础设施虽在不断改善，但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剧，资源利用粗放，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城市污染向农村扩散。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乡村不仅要满足人们对美味可口、营养安全等美好农产品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对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等美好生态产品的需要，还要满足人们对传统文化、乡愁等美好精神产品的需要。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要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抓手美化乡村，用绿色点亮乡村。加快健全城乡融合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推进乡村生活垃圾治理、“厕所革命”、治污治乱等工程，推动河道山塘整治；完善乡村建设规划，规范农民建房，强化村容村貌管理和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推广农村节能环保技术，开展绿化模范乡村创建活动，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消费绿色化，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使乡村成为支撑中国现代化全面推进的美好家园。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弘扬传统文化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乡村振兴，风气为魂。伦理道德是引导社会风气和凝聚社会人心的不可替代力量，是乡村治理的灵魂。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的衰落首先是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文化日益边缘化，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严重缺失，随着“空心村”现象不断增多，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面临困境，一些低俗的不良风气和消极思想趁虚而入在农村蔓延，恶化了乡风民俗。乡村社会道德建设必然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求治之道者，莫先于正风俗。可以说，想要富口袋就必须先富脑袋。

而乡村的民俗习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内容，而生祭婚丧节庆是农民的头等大事，关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荣誉、面子，也是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有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而不断？是什么力量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建立在家园、家庭、家人之上的家国情怀，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家，哪有国？有了家就有了家庭的归属感，知道自己生命的源头，感恩亲人的抚育与呵护；有了家庭的归属感就有了家族和家乡的归属感，知道自己来自何处，眷恋成长的故园；有了家族和家乡的归属感就有了宗族和民族、国家的归属感，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担当着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故情系故土，小而思乡，大而思国。而乡村的民俗习惯在其中发挥着特殊的纽带作用：家庭通过乡村的民俗习惯这个精神的归宿将家乡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家族通过乡村的民俗习惯这个血缘的密码将宗族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从而将祖源认同与民族认同合为一体，使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归属，具有巩固中华共同体的作用。

因此，一方面，要把以规立德作为净化乡村社会风气的治本之策，突出村规民约的观念引导和行为约束作用，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文明村”“文明户”等文明创建与评议活动，采取各种有效形式激发农村传统文化活力，不断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使风清气正、向善向上的舆论导向推动自我教化，形成良好的村风民俗，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主题在乡村文明创建与评议的小活动中落地生根。而另一方面，乡风文明建设重在引导，不能用行政手段过分干预禁止。当前，有些地方在乡风文明建设中搞形式主义，不分对象硬性规定

婚丧只能办多少桌酒，桌上只能摆几样菜，菜只能是哪几个品种等，让农民十分反感。因此，移风易俗要发挥乡村社会组织如红白喜事理事会等机构的自治劝导作用，乡风文明只能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

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活力。因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更好地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一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这一最大的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导致不平衡、不充分的核心是与工业化、城镇化相比，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红利、改革红利尚不足以有效激发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能，根本上是体制机制与政策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因此，也就必然要求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路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清除阻碍要素下乡各种障碍，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变迁，实现乡村振兴。

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与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是导致“三农”利益流失，形成城市对乡村资源的“吸附效应”，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原因。解决好这两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乡村由被动发展向主动发展转变。为此，必须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关键，清除阻碍要素下乡各种障碍，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战略重点。这需要以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职能边界与相互关系为前提，既要全面发挥市场更加有效地配置要素的作用，促进城乡要素权利保护机制、要素市场体系、收益分配机制的协同，激发市场主体投身乡村发展的活力；又要全面发挥政府更加有效地支持与保护农业、服务农村、协调利益、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形式、标准、机制、政策等系列内容，这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核心问题。

而土地制度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无疑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基石。尽管中国乡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最基础性的方面是土地制度与集体产权制度未能有效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农村的资源资产未得到有效盘活，导致资源要素长期向城市单向聚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从产权入手将三农政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就必须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围绕解决乡村各类主体发展不平衡、小农户分享农业现代化成果不充分问题，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农民增收渠道拓展不充分问题，城乡资源配置不平衡、农民权益享受不充分问题，从稳定农户的承包权、落实集体成员权、放活经营权三大重点，作为新时代深化农村土地制度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构建符合各地客观实际的农村土地制度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体制机制，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央农办乡村振兴专家委员；来源：《群众》杂志 2019 年第 7 期）

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部

——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朱丕荣

我是 1950 年 8 月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农业部工作的。在上海复旦大学农艺系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服从分配，象参军一样（供给制待遇），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人事处到上海接收，分派到农业部粮食生产司种子处工作，以后调杂粮处，1972 年调计划司，1979 年调外事司工作，1988 年退休，退而不休，继续为三农事业做些力所能及工作，迄今快 70 年了，一生为“三农”振兴服务，是值得高兴的。

我是一个“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缺乏实践锻炼，经过工作、下乡、蹲点、下放、劳动、政治运动、出国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磨练，逐步成长，艰苦奋斗，为三农办了一些实事，是可以告慰的，当今已是 90 多高龄老人，依然健在，欢渡晚年生活，很不容易，十分欣悦。

现在我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部情况作一简要回顾，供大家参考，从历史中可以得到教育启示。

一、机构设置

农业部成立时，属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属的部级单位，农口有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气象局。农业部设有办公厅（秘书处、行政处、机要室、资料室、苏联专家室等）、计划司、粮食生产司、工业原料司、畜牧兽医司、渔业司、农政司、土地利用司、病虫害防治司、农具司、人事司、国营农场管理局等行政单位。还有华北农科所、水利推进社、农业电影社（制幻灯片）、华北农业机械厂、双桥农业干部学校等事业单位。

二、领导人员

部长级：以民主人士为主。部长是李书城（知名民主人士）；副部长：3 人，杨显东（留美、农经、棉花专家、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吴觉农（留日、茶叶专家、复旦大学农学院教授）、罗玉川（中共党员、党组书记、不久调任平原省主席）。办公厅主任张林池（中共党员，罗玉川调离后，担任副部长，党组书记）。

各司局长的正职、第一把手，大都是非党人士；技术专家、留学生，如王绶、孙文郁、程绍炯、孙恩吝、张乃风、吴福祯、刘定安等。

解放区来的革命干部一般任副职。

三、干部队伍

机关行政干部不到 300 人，分三类人员，大体各占三分之一。一是从解放区来的革命干部，大部是党员，担任司、局、处、科级职务，是骨干力量；二是聘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旧政府农业官员，农业科教的职员、专家，熟悉一些农业状况；三是从大专院校刚毕业分配来的青年，有专业知识，大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少数是党员，朝气蓬勃，较为活跃。

四、干部待遇

专家、技术人员，采取工资制（低薪）。从解放区来的革命干部和新来的青年，采取供给制，分小、中、

大灶三种级别（按小米斤数计算）。当时象我按大灶待遇，每月约 13 元人民币，伙食费开支约 9-10 元就够，剩下的 3-4 元可以购置一些日常用品，如衬衣、毛巾、肥皂牙刷、牙膏等。供给制的，每年还免费发放两套制服（单的和棉的中山服）。有经济困难的，可以申请补助，下乡出差，每天可以补助 2、3 角。

五、机关生活

办公地点：在东城区老钱局，北京火车站前边，原棉产改进会四层楼房，有食堂和操场（可设排球、篮球场）。

集体宿舍均在附近的扁担胡同和裱褙胡同、小红楼等。

当时，青年大部未婚，住集体宿舍（上下铺，同学校一样），在机关食堂用餐（早、中、晚、假日都供应），很便宜（烧饼、油条只 1、2 分钱，炒菜只几分钱），买日用品可以到机关合作社（小卖部），入社入股，有优待还分红。每周，六天上班，星期天有时义务劳动，大家动手，打扫卫生，周末，下午有球赛；晚上一般办舞会，跳交际舞，由俱乐部、乐队组织，不光青年参加，司局长、部长也来参加，很热闹、活跃、愉快，那时没有电视，偶然组织看一次电影。

六、学习制度

每周一到六，早上先学习一小时，再上班办公，每周一、三、五晚上也要学习一小时，内容是系统学习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毛主席文章或时事社论，很重视政治理论学习，每星期三的下午，为业务学习（结合工作专业）。部里设有一个学习委员会（由机关党委领导）组织领导，印发学习计划、提纲，有时有辅导报告，还组织考试，写心得、总结交流，坚持执行。

七、组织生活会

领导与干部一般在大办公室一起办公、学习，上下级关系密切，经常接触。每个月或每个季度，以处或党团支部，要开过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检查思想工作表现、优缺点，鼓励进步，改进缺点，相互帮助提意见，真城亲切、开诚布公，反对背后议论，搬弄是非。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与人为善，治病救人，防止犯错误。

八、行政方式方法

1. 发扬集体民主精神，议论决策。部里一般每周开部务会议，由部长与司局长参加，集体讨论大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那时全国设有六个大行政区（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华东、西南）都有农业部。由于全国地域辽阔，因地制宜指挥生产，大区一级，有重要作用，负担不少任务。靠大区指挥省、自治区、直辖市，更及时和有针对。性。（农业部文件常提“抗旱保墒”，南方就不理解）。部里每年要召开大区农业部长会议和各省区市厅局长会议，总结工作，研究问题，提出建议措施，贯彻实施。

每个生产季节：由政务院（后称国务院）发布指示（如春耕生产，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冬季生产），统一部署三农工作。（改革开放以后，每年由中共中央发布的 1 号文件）

农业部一般派干部下去调查了解各地对贯彻政务院指示的情况，总结典型经验加以推广；发现问题采取措施并通报各地引起注意，认真解决。

2. 重视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培养发现总结先进典型经验，加以宣传推广，作为一种重要领导方法。当时国家财政经济、投入困难，农村贫困，生产资料供应不足，只能依靠调动农民生产、劳动积极性来推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振兴。如进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提高农民增产积极性；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解决劳动力，生产资料不足困难；开展爱国丰产运动，评比竞赛，奖励劳动模范，以

点带面，推动与鼓励农民增产积极性。农业部每年冬天，召开农业劳模大会，结合举办展览会，大肆宣传推广。1950年5月召开全国农业技术会议认为：评选推广优良品种是最简而有效的增产措施，农业部大力支持贯彻执行，制定了“五年良种普及计划”。以后从总结群众丰产经验中归纳总结出“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增产措施，更有力认真贯彻推行。开始几年，淮北地区夏季常遭水灾，没有很多救灾粮发放，就调拨荞麦、蔓菁、马铃薯等早熟作物种子，利用灾后短时期就能生产食物，实现农民生产自救。总之，措施要投资少、收效大，切实可行，适合群众需求。后来国家发展农用工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有实力支援农业。

农业部的干部要经常下乡，到基层去调查研究，督促检查，了解实际，总结经验，宣传推广，一般我们每年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农村去。那时下乡很艰苦，部里开个介绍信，经过一下省或直接到县里去，没有人陪同。农村交通不便，又无旅店，需要带着行李用品，住在老乡家，派饭吃，常是步行到乡村，走几个小时，才到目的地。利用晚上访问农民或开会。

在部机关办公，主要收集资料，研究处理公文来往或准备召开专业会议等外，还有一项群众来信来访，需要答复处理。领导上很重视，是正确对待群众态度问题，很严肃认真。这方面，有时要去图书馆或请教农科院专家，花很多时间。但也是个学习机会，首先要搞清楚科学根据，自己懂了，才能答复，对提高自己业务水平，很有帮助。后来部里设专门信访和上访接待室统办。

最后讲一点感受和体会：

7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三农”状况大有改善，七亿多人口脱贫，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个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变成开放进步的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声誉与地位大为提升，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这是令人鼓舞的。

1. 我能在农业部为“三农”事业服务，办了一点实事，要衷心感谢党对我的爱护和培养；感谢党与人民对我的信任。我从一个团员成为中共党员，从一般干部成为司级干部，教授级高级农艺师，还当选过联合国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委员。一生活活动范围，国内除台湾、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去过；国外，曾先后到过近20个国家。从一无所有，到有一幸福的家庭和四间住房，生活越来越好。感谢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优越性）。

2. 在农业部工作这一辈子，尽管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但多次政治运动，也遭遇到很大冲击风险，提心吊胆，怕说错话，贻害一辈子。农业部反右派运动中，右派分子高达8-12%（超过5%）；农业部一度被批为“技术促退部”，二次精减机构，调离农业部的人不少；1959-1961年期间，我被下放四川三台县当农民，差一点饿死，一天粮食定量只半斤（丘陵地区劳动量大）。文化大革命中，有5、6年没有很好工作，有些遗憾。经70年仍能健在，还是十分幸运的了，要珍惜时机，过好晚年。

3. 农业部机关工作，靠集体、组织行为发挥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发挥集体智慧，群策群力，每个人起螺丝钉的作用，做好本职岗位工作。在70年中，我失去了许多老领导、老同事、老同学，他们同样为“三农”事业，勤奋工作，作出过贡献；他们还曾经教育帮助支持过我，我深切地怀念、感谢他们，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

（作者：原农业部国际合作司长，2019年4月）

乡村振兴是历史的必然

陈锡文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就乡村振兴战略、“三农”发展等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刚刚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扎实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的贡献。

为何一号文件长期聚焦“三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是什么，取得了哪些变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在麻辣财经两会特别节目中，与人民日报记者高云才、冯华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麻辣”对谈。

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冯华：陈主任，首先欢迎您的到来。我们都知道您是参与了十几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制定工作，可以说对一号文件了如指掌，我们首先想问一个和一号文件有关的话题。前不久发布了今年一号文件，和农业相关，提出了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当前我们的经济形势下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复杂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一号文件还是要聚焦“三农”，并且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陈锡文：我想这个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所决定的。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口多，我们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刚刚公布的统计公报指出，我们去年的总人口是13亿9538万人，接近14亿人了，光是这么多人，要保障大家能够吃饱吃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农业就有很大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一直讲粮安天下，粮食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从这个角度讲，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什么时候把“三农”问题放在第一位都是真理，都是必要的。

第二，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大家都知道城镇化在快速推进，城乡人口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即使到了现在，去年年底，城市人口大概是8亿3100万人，但是还有5亿6400万人在农村。5亿6400万人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在世界排第三位，如果和我们国家自己比的话，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会还要多一点。从这个角度去讲，5亿6400万人，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建设现代化强国的

过程中，不能让他们落在后头，要让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进入现代化的进程。所以，现在城乡发展差距还很大，从这个角度去讲，关注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我们现在发展阶段必须重视的问题。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已经发了第16个中央一号文件，农民群众当然很盼望，16年来，大家都觉得，中央如此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这对农民是个很大的鼓励。全社会当然也很关心，因为农业的状况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生活，所以，他们也希望能看到中央如何进一步加强农业，使农业有更好的产出，能有更好的供给。所以，我想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和我们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就像中央强调的，始终都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不仅现在应该把农业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今后相当长时间也会是这样。一号文件关注农业的问题，关注“三农”的问题还会持续下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是什么

冯华：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您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农业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在您看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是什么呢？

陈锡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且把乡村振兴战略和十九大提出的其他六个战略，一共七个战略一起写入了党章的修正案，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想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根本的一点，跟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农业农村地位是一样的。我想最主要是两个必然性。一个必然性，现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我们国家的国情、和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具有它的必然性。第二个必然性，它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当吻合的，因为也有必然性。从第一个角度去讲，十九大报告，大家都关注到总书记曾经讲到，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和过去有了变化，这个变化转到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总书记也明确讲到过，我们发展中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平衡、不协调最主要体现在哪里？就是体现在城乡关系上，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说发展不充分，是体现在乡村上，乡村和城市相比，乡村发展是太不充分了。要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不断增加的需求，就要解决好这个不协调和不充分的问题，这样就一定要让农业农村能够有更快的发展。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也明确提出，要始终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就是基于我们矛盾中的这两个焦点体现在这儿。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要实现全面小康，要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需要农业、农村有更快的发展，能够和城市同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国家的国情和现在发展阶段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矛盾，说明了不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你可能就实现不了这些目标，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不断增加的需求。这是一点。

第二个意义体现在，它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吻合的。现在提出乡村振兴。我们大家都知道，远古时期没有什么城，只有乡下，所以城镇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一种现象。产生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从事农业的人生产的农产品，除了满足他自己的生活的必需之外，还有剩余的，可以提供给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事其他活动的人，让他们满足生活，才能活得下去。城镇是一定要建立在农业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才可以。历史告诉我们是这样。未来的农村发展，其实仍然对城市起着这样一种支撑和顶托的作用。

我经常想，城市和乡村发展，到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形成这么两大格局。仔细去看，这两者之间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城市和乡村都不是能够在现代社会里单独生活、单独存在，已经不可能了。城乡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整体一样，人有五脏六腑，有四肢，有五官，这是必须的，谁比谁重要？脑袋比心脏重要吗？还是胳膊比腿重要？没有办法进行比较，它们都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有机体，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因为城和乡之间具有不同的功能，我们说各自都有自己重要地位，但是都不能替代对方。比如说城市，基本功能就是集聚人口、集聚资金、集聚创造力，最后让城市成为带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极，这是它的功能。农村的功能，同样也是城市替代不了的，农村要生产粮食，保证国家和民族的粮食安全、农产品供给，又要保护好生态环境，为城市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生态产品，还要保护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所特有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要想推进整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最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边的功能都要发挥好。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去看，或者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去看，我们就能看到，城乡的功能都发挥好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比较好，反之，只重视发展一方面的功能，忽视另一方面的功能，它的发展一定是残缺的，不健康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去讲，我说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眼光是非常深远的，看到我们国家的特点，我们国家现在发展阶段，要解决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就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这个不平衡、不充分弱的一头主要是在乡村，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乡村振兴。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乡村振兴

冯华：陈主任经常也是会去农村调研的，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实施一年多了，在您看来，我们的农村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陈锡文：从十九大报告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总书记陈述了，它是相对比较长阶段内的一个总的抓手。某种程度上来说，从总书记的报告中能看出来，真正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那一天，应当是在我们第二个 100 年的目标，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那个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乡村振兴这个过程，从现在开始到基本实现，或者到了现代化强国那个时候，得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从目前来看，十九大到现在一年半时间，它

还是一个开局、一个起步。当然开局、起步是有基础的。我们2005年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新农村建设到现在，也十三四年了，这是个很好的基础。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有地方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等等。所以，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并不是说乡村振兴是从零开始的，而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有了很好的基础向前推进。那么也知道乡村振兴通过哪些途径怎么去抓重点，总书记讲了，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通过这五个振兴去实现五大目标，这样就越来越清晰了。正是在总书记一系列论述和中央作的部署下面，党中央和国务院又专门发出了关于2018年到2022年这五年的乡村振兴规划，第一个乡村振兴五年规划已经出来了。就我现在了解的，基本上我们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制定了各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五年规划，基本都出台了。我们300多个地级市的单位，大概有一半以上已经完成了地级市的乡村振兴的规划，我们大概两千多个县级单位，就是县市区单位，大概已经有超过四成，也做完了这个规划。听有关主管部门讲的，大概到今年年底，市和县这一级的规划基本都可以做完了，有了规划才能比较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进一步还有乡的规划，甚至到每个村的规划还要去做。

第二，大家在总结以前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根据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总书记讲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乡村振兴的总的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优先发展”整个我们实施的战略，包括十九大报告讲到优先的只有三个地方是优先的，一个是就业优先，再一个就是科教优先，教育优先，再一个农业农村要优先，可见它是在什么地位上。中央要求干部的配备要优先考虑，资源配置要优先安排，关于资金的投放要优先向它倾斜，政府提出的公共服务应该更好更多地向农村安排，这些思想和要求，我想正在得到贯彻和落实。尽管时间才一年多，而且从大家对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个大的思路的理解，到把握总书记提出来的总目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个总目标还有五大振兴的重点任务，这个清楚了，总书记讲，新时代的“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就是乡村振兴。再一个明确了总方针，就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如何把中央提出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总抓手、总方针能够贯彻落实到以后的工作中去，当前处在这个阶段。

我刚才讲的已经有了很好的举措，现在能看到，根据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中央的安排就会更加重视规划，怎么和更长远的目标相衔接。第二，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农田资源的保护。因为我们不是单纯的要把农村搞的这么轰轰烈烈，搞的和城里一样的产业，有个生态宜居，还有总书记讲，生态也要振兴，也更加去注重保护和发掘农村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引入农村所必须的人才或者培养自己的人才，以及更加重视乡村的治理，更加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这和以前有了很大变化，我想有了这些铺垫，有了这些开局、起步阶段的很好的工作之后，我想往后的乡村振兴一定能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作者：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来源：人民网）

求田舍地置地产

——“漫话土地”之三十五

景志刚

“盛世置地，乱世藏金。”无论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还是日新月异的工业时代，土地始终是最珍贵的稀缺资源、最关键的生产要素，也是最重要的家庭资产。

古往今来，土地的买卖与地权的变更，始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关系百姓冷暖，见证家族起落，映射国运兴衰，记载着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

公有与私有：地权的流转

与其他商品一样，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是一切土地买卖的前提。从早期的王有制、后来的私有制再到当今的公有制，土地交易如影随形，相伴土地所有制发展而断续起伏。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商周时分封建制，全部土地归天子所有，由天子来分封、赏赐、授予、收回。实际占有土地的诸侯、卿大夫或士，以及从事耕作的庶民和奴隶，均无处置土地的权利，更不能将土地当作商品来买卖。《礼记·王制》中的“田里不鬻”，便是当时关于严禁土地买卖的明确规定。

西周后期，诸侯坐大、王室衰微，诸侯或贵族之间因赔偿、赠送、交换乃至抵押、典当等而产生的土地交易开始出现，但形式上仍需天子许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井田瓦解，土地禁令名存实亡。商鞅“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以法律形式保护土地买卖，开历代之先河，合法的土地交易自此登上历史舞台。

从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承认土地私人占有，到汉初土地兼并加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买卖盛行于民间，土地市场雏形初现。北魏至中唐，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严格受限，土地市场缓慢发育，直至唐德宗施行“两税法”，彻底打开土地买卖的闸门，土地市场方才加快走向兴盛。

两宋“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直到明清，土地买卖如火如荼。宋代“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清代“人之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便是当时形象的描述。近现代以来，工业文明西风东渐，土地交易形式多样，土地不再被视为单纯的自然资源，而是在资源、资产与资本的相互转化中，支撑和推动着城乡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

买家与卖家：博弈的选择

买卖双方，永远是交易的主角。与一般商品不同，土地买卖的背后，往往是对立的阶级关系、复杂的社会结构、深厚的文化背景和不断变化的财富格局、经济状况。

卖家的时运。对于中国人来说，土地是饭碗、是生计，是财富、是家业，是实力、是地位。世人眼中的败家子，莫不以变卖祖宗田产为最，被族人和社会所不齿。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主动出售自己的土地。所谓“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细数古代变卖私有土地，穷困潦倒、贫苦无依者有之，或遭横征暴敛，或逢天灾人祸；债务缠身、以地抵债者有之，或陷经商破产，或遇道中落……直到宋明之后，民间工商业崛起，出售土地、筹措资本、投入经商的情况才越来越多。

买家的荣耀。在传统观念中，购田置地历来是光宗耀祖、福荫子孙的大事。无论是自京城致仕返乡的高官，还是本地富甲一方的豪强，平等交易也好，强买强占也罢，莫不以购置田产、兴建家宅为荣。即使富贵如汉相萧何，也曾因“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而被百姓上书告状。土地不忧水火、不惧盗贼，可取租息、可获增值，历来便是绝佳的投资对象。相比之下，经商利润虽高，但风险也大，远不如依靠土地收取地租更可靠。古人向来便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之说，先靠经商挣钱，后置田产保值。

“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十数年间三易主，焉知来者复为谁”……频繁的土地买卖中，往往时运无常、造化弄人，转瞬之间、角色互易。

活卖与绝卖：回赎的约定

中华自古重农抑商，对于终身务农的老百姓来说，土地就是赖以生存的命限子。即使迫不得已出卖田产，也要千方百计给自己留条后路，以便日后赎回。

活卖的惯例。活卖又称典当，也就是卖家转让土地时，保留在一定期限内回赎的权利。由于权利受限，活卖的价格大大低于土地的实际价值。对于卖家来说，既能解决经济困窘下的一时之需，又能暂时避免永久失去土地的噩运，而在买家看来，也可以较低价格购得土地，及时使用、出租以获取收益。《大明律集解附例》专门界定：“盖以田宅质人而取其财曰典，以田宅与人而易其财曰卖，典可赎而卖不可赎也。”

绝卖的后果。无任何附加条件买卖土地，或活卖之后过期不赎，即成绝卖，又称永卖、断卖、杜卖。古代民间的土地买卖，平民百姓大多采用活卖，而富贵之家绝卖则比较常见。为避免纠纷，交易时一般要加以注明。《大清律例》规定：“嗣后民间置质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其内注明回赎字样，如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绝卖，永不回赎字样。”

土地不仅关乎生计，也维系尊严与情感。“贫民下户，尺地寸土皆是汗血之所致，一旦典卖与人，其一家长幼痛心疾首，不言可知。”由此，“日夜夫耕妇蚕，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饱，一缕之丝不敢以为衣，忍饥受寒，株积寸累，以为取赎故业之计”。

限购与限售：另类的规则

土地和房屋不可移动，既是生产的平台、生活的空间，也承载了家庭财富、宗族关系、户籍管理、社会稳定等多重意义。土地的买与卖，历来便受到诸多限制。

限购的逻辑。宋元明清诸朝，为防止腐败，均对官员购置田宅进行诸多限制。宋代诏令“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禁止京官购买第二套住宅；元代要求蒙古官员不得在原南宋统治的江南地区购买田宅；明代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清代增设“旗员历任外省，有在任所置产者，勒限责令，变价回旗”。尽管这些手段最终也未能防止官员受贿，但却不失为今天的反腐倡廉提供一点借鉴。

限售的规矩。自唐宋起的千余年间，“求田问舍，先问亲邻”成为官方政策，即出售房地产，必须征得亲戚、邻居和族人的同意，并给予优先购买权，否则不能交易。唐代规定“天下诸郡，应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宋代要求“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据全业所至之邻皆须一一遍问，候四邻不要，方得与外人交易”。直到清末民初，尽管已无法律限制，但民间因无法取得邻居同意而取消田宅买卖的事件仍时有发生。

红契与白契：逃税的代价

古语中的“契”，本意为刀刻，后引申为刻录在金木或纸帛上的承诺。所谓“空口无凭，立字为据”，买卖签订契约，自古天经地义，而对于土地之类的重大交易更是不可或缺。

红契的效力。买卖田宅必须缴纳契税，已成历代惯例，也是朝廷的重要税源。这种依法纳税、由官府加盖红色官印的契约，称之为红契、赤契或朱契。两宋时，官府印制统一格式的契约，称为“官颁契纸”，写明买卖双方姓名、交易原因、标的价金、担保条款等内容。经官方验证登记的地契，属于合法合规的交易，受到法律保护。

白契的风险。红契虽然有保障，但需缴纳契税，先是由卖方缴大头、买方出小头，后来全部由买方出钱，成为不小的负担。老百姓不堪重负，往往私下签约交易，不再到官府缴税登记，这种未经验证盖章的契约称为白契。白契在民间大行其道，节省费用，但不被官方认可，产权不明，安全性差，引起的田宅纠纷俯拾皆是。即使诉诸于官府，也不会赢得争讼。

舍红契而取白契，显属偷逃税款，历代均严厉打击。南宋时“匿税者，笞四十；税钱满十贯，杖八十”；明代规定，不税契者，除刑事处罚外，一半价款要上缴官府……

田宅虽小，关乎全家生计；地契虽轻，记录千年浮沉。“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古人的理想至今仍具现实意义。让我们在地权的变迁中感受民生、感知民意，在历史的脉络中品鉴得失，把握未来。

（作者单位：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小岗的三种颜色

——在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周年与乡村振兴战略研讨会暨

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年会上的发言

李朝民

按照会议议程，现在由我来跟大家分享小岗村 40 年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小岗村政治特色鲜明，无论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还是群众基础、干部队伍等方面，在中国都有一定代表性，它的发展既有其政治关注的特殊性，更有其通过自身资源挖掘、发展、壮大的普遍性。小岗村现在村域面积 2.25 万亩，农用地面积 1.95 万亩，有 23 个村民小组，1040 户、4209 人。

下面，我从一名记者角度，讲讲对小岗村的一些粗浅认知。如有不妥，敬请批评指正。

我只讲三个关键词：红色、绿色、蓝色。

先说红色。1978 年年末的一个寒夜，在一间极其破旧的农舍里，几个村干部和村民代表聚在一盏煤油灯下，表达着各自的坚决，最后以“立誓为盟”的形式，用 18 枚朱红的手印，“画押”了一份“包干到户”的“中国农民宣言”。

20 世纪 70 年代末，整个中国都在搞公社集体经济，“包干到户”是绝对的“红线”，是公认的资本主义，碰不得。然而小岗人就这么做了！他们敢为人先的故事被写入了中共党史。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小岗村时说：“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小岗村改革发展步入快车道。小岗村牢牢抓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个主线，不断深化农村关键领域改革。小岗村对集体土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权登记颁证，巩固了所有权，稳定了承包权，用活了经营权。同时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16 年，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与小岗创发公司按比例搭建股权结构。合作社探索以小岗村品牌等作为无形资产和经营性资产联合入股小岗创发公司，作价 3026 万元，占股 49%，赋予权能，量化到村民。2017 年村集体收入 820 万元，2018 年实现首次集体资产收益分红，人均 350 元，村民从“户户包田”到“人人持股”到“人人分红”，分享了集体经济的红利。1978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仅 22 元，2017 年达到 18106 元。

小岗村的改革实践，是一部鲜活的农村改革史。在小岗村采访，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小岗红”。40年来，小岗村从“红手印”点燃改革，到“红证书”铁证实权，再到“分红利”增收富民，几乎在每个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都流润着独具中国智慧的“小岗红”。

“小岗红”，是中国改革的底色，以其丰富的内涵，高度概括着一个真理：人民是改革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共产党则是改革的主心骨和领路人。

“小岗红”，展现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红心。以小岗农民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开展的多种形式的“大包干”，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从农民的愿望出发，尊重群众创造，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全心全意为农民群众谋幸福。当前，为农民群众谋幸福的最大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小岗红”，展现的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的初心和红心。40年，小岗村从“大包干”实现“两权分离”，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再到“三权分置”“三变改革”，一直坚持改革和探索不动摇。40年前，土地由“合”到“分”，解决了吃饱肚子问题；40年后，土地由“分”到“合”，解决的是发展致富问题。后者之“合”是在保证农户承包权利不变前提下的“合”，是小岗改革的升级版。40年来，改革成就了小岗。在新的历史阶段，小岗仍然需要深化改革。但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是我们改革中必须坚守的底线思维。

“小岗红”，展现的是不断维护发展农民权利的初心和红心。农村改革40年来，不管改革如何推进、怎样深化，但改革者始终初心不变，红心长在。就是要确保农民权益不受损害，在改革中，农民群众的权益只能增不能减。这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比如土地确权颁证，比如“三变”改革，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真正让亿万农民吃上“定心丸”。

再说绿色。推进小岗农业转型升级，是小岗村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今小岗村聚焦现代农业、农产品深加工和旅游三大主导产业，开展“高校+集团+农村”合作，努力实现三产融合、绿色发展。突出变化是：

激发一批青年人干事创业动力。严宏昌之子严余山，以前在外打工，如今回来了，成为首个入选小岗村党委的“岗二代”。殷玉荣是小岗村十佳致富带头人之一，以前和爱人也是在外务工。2012年，看到小岗村发展得风生水起，夫妻俩就返乡养猪市场好的年份收入达50多万元。越来越多的人返乡，似乎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改革是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引来一批“金凤凰”安家落户。北大荒集团流转 500 亩地，建成现代化水稻生产基地；安徽省小岗盼盼食品公司，如今部分厂房可以建成投产；安徽农垦集团流转 4300 亩地，实行统一管理经营……近年来，小岗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延长、附加值增加。2014 年，5 平方公里的小岗产业园正在加快建设，盼盼食品、微观农业蒸谷米深加工等项目纷纷落户小岗。

最后是蓝色。如果说红色吸纳了朝阳最富生命力的元素，绿色采撷了春天万物生长的蓬勃，那么，蓝色，则浸染了天空博大、勇敢、理智的意象。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小岗精神的诞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求变图强基因的传承，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成果。小岗精神的第一座丰碑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大包干是“吃饱饭”的问题倒逼、农民主动探索、党的各级干部敢于担当、党中央英明决策的成果。它催生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为全面改革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历史往往在曲折中前进，改革也常常伴随着阵痛。上世纪 90 年代，小岗村和全国许多乡村一样出现了发展困境。中国共产党最讲究实事求是，自 2004 年起连续 15 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书写了“三农”发展的历史篇章。正是这段时间，诞生了小岗精神的第二座丰碑：沈浩精神。沈浩同志在担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近 6 年时间里恪尽职守，为小岗干了很多实事，村民连续 3 次按红手印留他。沈浩精神是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

围绕小岗人敢为人先精神和沈浩精神，小岗人开始挖掘自己的文化潜力。“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当年农家”等，一起组成了小岗村红色旅游矩阵，让小岗跻身国家 4A 级景区，每年吸引几十万游客来探访小岗新貌，汲取改革的精神。“看到今日小岗的繁荣景象，内心非常自豪！”“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关友江笑着说。

小岗之路，就是中国改革之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小岗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看了让人感慨万千。实践证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

俯瞰今日小岗，乡村振兴的大势日渐形成，一幅崭新画卷正在激情绘就，犹如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广袤乡野，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充满活力的万千气象。展望明日小岗，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迈入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必将激励“岗人”勠力同心，共同谱写更加壮丽的诗篇！

（作者：农民日报社政治社会部副主任，2018 年 12 月 22 日）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的丹阳路径

张旭红 潘玉华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传统的村级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资产管理运营机制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为了改变村集体资产当前存在的“人人有份、人人无份”问题，江苏省丹阳市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进、全面铺开”的工作节奏，稳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将农村集体资产折成股权，让农民成为股民，充分享受村级经营性净收入的分配红利。

意义

有利于规范“三资”管理。这是开展股份制改革最直接的现实意义。当前，丹阳市农民年底分配收入主要来源于组级资源发包的收益分配，村级分配相对较少，农民更多关注组级财务管理，对村级财务关注不多。开展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后，农民群众可以“额外”享受到村级经营性净收入的分配红利，进而更加关注村级“三资”运行管理情况，提高民主参政意识。

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涉及农民切身利益，早改早主动，晚改后患多。一方面，农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基本完成了农民承包地资格的确认，这为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打下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普遍不高，股改后的“分红”较少，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对宽松，推进改革矛盾较少。因此，即便是集体经济相对薄弱、股改后没有分红的村，也应尽早完成改革任务。

有利于保持农村和谐稳定。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最大的特点是将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可以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股权，从制度和体制上解决有可能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同时，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清查，既可以明确债权债务，又实现了资产管理的公开透明，还可以借助股份制改革收益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村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此外，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稳定。

现状

2004年，丹阳市开发区车站社区率先探索股份改革试点，并于2007年12月成立镇江市首家社区股份合作社。通过股份制改革，车站社区实现了集体资产的规范管理和保值增值，2017年集体总收入达1742万元（经营性收入1820万元），是试点前3倍多。

2017年，按照镇江市委、市政府“三治理一挂牌”专项行动的统一部署，丹阳承担7个村（社区）股份制改革试点任务。为扎实开展好这项工作，丹阳市主动“走出去”，赴苏州吴中区、浙江德清县学习考察，结合丹阳实际，因地制宜、积极稳妥推进。到2017年底，7家试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完成了挂牌，共折股量化经营性净资产2.29亿元，发放股权证4250份，受益社员14155人。试点过程中，重点明确了五大原则：一是“生不增、死不减”的静态管理方式，以股权界定基准日为节点，基准日前死亡的和基准日后出生的人

员不享受股东资格，并通过户内继承解决新出生人员的股权问题。二是股权设置以人口基本股为主，可设享受股，不设集体股、贡献股（农龄股）。三是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股权证核心是记载享受股权的数量，而不是资产量化数额。四是对成员身份界定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方式进行，最终成员界定方案由各村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五是收益分配的原则是对经营性净收益按同股同利进行分配，分配的比例不超过经营性净收益的60%，组级分配不与股份制改革挂钩，仍按原模式进行。

2018年，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开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制定出台了《关于丹阳市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2018年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工作，确保年底前全市70%的村（社区）完成改革任务，有条件的乡镇力争全面完成，2019年实现全覆盖。

制约

一是思想顾虑问题。业务部门层面，丹阳作为镇江的先行先试地区，在缺乏操作规范和有益经验情况下，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免不了要多探索。村民层面，因为能够获取实际利益，大多数村民对改革持欢迎态度，但对改革的具体内容了解不深，一旦宣传不到位，很容易产生认识误区。二是成员界定问题。从试点情况看，改革的难点集中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界定，主要是农转非人员、外迁户、农村婚嫁妇女等群体身份界定争议较大。三是工作质量问题。调研发现，少数镇村还存在为改革而改革，满足于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对于改革的目的和意义理解有待进一步加强。

对策

发挥领导小组作用。成立市、镇、村三级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坚持一把手负总责，通过层层分解任务，分片包干抓落实。制定出台运行和推进机制，如每周周报制度、每月交流汇报制度、矛盾问题会商制度等。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周梳理汇总基层反映的问题矛盾，给予相对明确的政策答复。对于重大疑难问题，及时提请领导小组研究讨论。对于全市比较典型的共性问题，及时形成政策解答汇编。

加大业务培训力度。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责任大、任务重、专业性强，各镇村负责人员和具体操人员必须做到责任在肩、业务精通。积极开展各类业务培训，下发统一的操作规则，指导各镇（村）牢牢把握改革流程。根据改革进展和存在问题，对存在问题较多的镇村，开展一些“短平快”的针对性培训。

加大督查考核力度。从前期试点情况看，镇村主要领导重视程度、投入精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股份制改革的进展。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矛盾，需要及时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协商讨论，否则工作进度就会“一步慢、步步慢”。为此，要从督查考核入手，制订详细督查计划，每周通报进度，严格兑现奖惩。在督查进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查质量，重点督查每一份签字是否真实有效，每一个环节是否有据可查，每一份档案资料是否完整规范。

规范合作社经营管理。建立股份制合作社不是目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合作社的规范化运行，规范“三资”管理，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因此，股份制改革完成后，必须考虑合作社如何运营。一方面，要讲规范，结合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确保集体资产资源交易“应尽必进”；另一方面，要谋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

（作者单位：江苏省丹阳市农业农村局）

我国对籽粒苋草产业的创新开发与国外对苋研发的新动态

孙鸿良 岳绍先

摘要：当前我国由企业与企业与科技联合开发的籽粒苋青贮袋状饲料已获成功。这是国际首创，也是智库时代创新的产物。本文举例了正在研发的籽粒苋青贮饲料的四种成功模式。由于苋籽的特殊营养价值，国外多在利用苋籽所作的食品上开发。当前国外发展趋势是由营养食品走向功能食品，以及增加谷物多样性以适应当今气候变化特点的需求。据此，籽粒苋将是可供选择的未来粮、饲兼用作物；又是抗逆性强的可对应特殊气候变化的作物，可以在我国边远地区及受损、低产地区大力发展，尤其可贵的是对其种植可与生态文明建设接轨，从而走向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前景广阔。

一、籽粒苋青贮饲料在我国研发是时代的产物

习主席在 2016 年就已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时代”。继而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科技智库的时代”。的确，在此时代下涌现了一批农民企业家，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与科研人员合作创办新型产业的现象。他们不向国家要求资金支持，只凭一种爱国心与坚信成功的坚毅决心而作出了可观的付出。他们眼看我国饲料数量与质量上严重不足，屡屡向国外进口而处于不稳定状态，而纷纷来找曾经研究籽粒苋几十年的我们来共同改变现状。我国在 2012 年就从美国进口优质紫花苜蓿 45 万吨，而 2016 年就上升为进口 146.31 万吨，数字还在逐年上升。我国虽也大力推行紫花苜蓿，但产量质量日趋下降。他们认定推广籽粒苋草产业将会缓解国家对饲料的需求，并起到快速脱贫致富的作用。本作物科学研究所拥有的是从美国茹得尔有机农业中心引回的优良苋品种并通过国家审定了的优质种子，生态农业理念与生态工程构建技术；而企业家拥有的是投入种植与全套机械化加工条件，市场信息、物流渠道、扶贫预测等，他们做到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因此这样的合作不觉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的时代”，而拉开了苋产业创新建设的序幕。

二、我国籽粒苋开发青贮饲料的几种成功模式

1、河北永清低产地种苋的企业与科技的初始联盟模式⁽¹⁾

河北廊坊市永清县自 2015 年以来，由中苋农业科技开发公司永清分公司出资租地 3000 亩来种苋，用生态工程技术与完整的机械化手段使苋青贮饲料获得高产并得以高质量地包装，经济效益显著。除去租地每年每亩付出 1000 元外，又请当地农户加以种植，每天每人工资 100 元以上，使农民增收又不担风险。苋青饲料的产量每亩约 10 吨（割两茬），最终经过混合作物秸秆，投入发酵剂、包装发酵、在露天保存两个月就可饲用，保存期可达两年。初步计算每吨投入资金约 1000 元，而产值可达 1600 元，收益每亩 10 吨共 6000 元，

如扣除每亩 1000 元租金，纯收入可达 5000 元。这样农民既不担风险而收取了可观的土地出租费、劳务费以及饲料养畜所得的增值费，人均年收入可达近万元。用于喂猪、羊等，不仅畜产品增加而且起到可节约粮食饲料 1/2 的作用，因为饲养高蛋白（粗蛋白含量 18-21%）的苜蓿青贮饲料可少喂 1/2 玉米粒，获取了生态、经济、社会三效益同步发展。

2、山西五台山乱石山沟内搬石种苜的公司+农民+合作社模式⁽²⁾

五台山高洪口乡是一个乱石山沟的贫困乡，2011 年人均收入仅 1600 元，以致农民多出外打工，农牧业萎缩。2012 年开始由五台县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我们合作构建“农民+公司+合作社”的经营模式，而获取了经济、生态、社会三效益。这个企业公司先出资将山沟内的积石搬石平地，再填土种苜，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与利用籽粒苜的耐瘠薄的特点，进行生态工程建设，几年来已初步建成了富饶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家园。企业还购进了一批小尾寒羊，建立羊场，喂饲苜青饲料与青贮饲料，还拟将小羊分散至农户饲养，待羊长大后再收购统一出售。现农民仅在种苜与加工的劳力收入上每人每年可得 0.6-1 万元，不仅初步脱贫，同时改善了生态环境条件。

3、内蒙古库布齐沙地的快速修整露天煤矿复垦地的公司+农民模式

露地煤矿的复垦地最大特点是将深达上百米生土翻上来，其贫瘠程度可想而知。2015 年开始由中煤神州节能环保有限公司在内蒙古的库布齐沙地上以及大同以西的空旷复垦地上种苜获得初步成功。由于籽粒苜抗逆性强，不仅抗旱、耐盐碱、还耐贫瘠，并缓解水土流失灾害。过去种过玉米、向日葵等皆长不高，不仅产量低且受灾损失重，因此对复垦地改造缓慢。而今种苜后不仅产量增长，而且有一定抗灾能力，例如风灾后折断主干能从下面侧枝出芽而很快复生，依然收割了可观的青饲料。他们拟进一步与养牛场合作用畜粪养土以推进复垦地翻新的进程。

4、山东高密县在小麦夏收后种苜饲养大型肉牛以提高粗饲料营养水平的农场+农户模式⁽³⁾

以中国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原所长，养牛专家陈幼春教授曾在山东高密种苜饲养良种肉牛为例，说明苜对良种肉牛饲喂效果良好。结果表明，小麦收割后种苜在亩产苜青饲料 6.5 吨情况下，将 58 亩苜青饲料与当地小麦、玉米秸秆混合制成的青贮饲料（配方是苜自然重：去穗玉米秆：小麦秸为 7:1:3），提供了 5 头青年种公牛和 58 头青年牛胚胎移植工程所需的粗饲料。牛的总增重达 7710 公斤。据计算，每公斤肉牛净增重的成本按当时计价才 3.262 元，相当于 1.3 亩青饲料可以养一头大型肉牛，而国际上要 15 亩牧草地才能养一头牛。

以上事例说明，拥有同样中国梦的民间企业家们与我们合作开发苜产业，正体现了中国智慧与共同的历史担当可以用国家所提倡的“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的模式来达到成功，证实了这种合作智慧潜力释放之大。

三、国外对籽粒苜的营养价值与综合研发现状与趋势

由于苜籽的营养价值远高于一般谷物⁽⁴⁾，其蛋白质含量 14-18%高于一般谷物的 30-50%，赖氨酸为小麦两倍、玉米的 3 倍，钙含量为小麦的 7 倍、锌的 10 倍、铁的 10 倍，磷为一般谷物的两倍，还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等。目前国外多致力于利用苜籽开发为营养食品与功能食品并走向医疗保健产业。

例如按 Caselato-Sousa, V.M 等研究（2012）报道⁽⁵⁾，与真正的谷物相比，籽粒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假谷物，含有较多的蛋白质。它是一种均衡的食品，具有功能特性，已被证明具有一定药用价值，所归因对健康的益处包括降低血浆胆固醇水平，刺激免疫系统发挥抗肿瘤活性，降低血糖水平和改善高血压和贫血症状。

此外, 据报道它具有抗过敏和抗氧化活性。Tang. Y 等 (2017) 报道⁽⁶⁾了藜麦和苋籽中的植物化学物质及其抗氧化、抗炎和对潜在的人类健康的有益。他们表明藜麦和籽粒苋(红苋)是含有大量营养素和微量元素的假结晶谷物, 介绍了二者种子成分的植物化学成分, 亲水性(如酚类、B 花青素)和亲脂性(如脂肪酸、生育酚和类胡萝卜素)营养素的抗氧化和抗炎活性, 以及这些对潜在健康的贡献益处, 特别是降低氧化应激相关疾病的风险, 例如癌症、心血管病、糖尿病和肥胖症, Kumar K. V. P 等 (2016) 研究表明⁽⁷⁾, 有可能从籽粒苋制备具有良好抗氧化能力的蛋白质, 纤维和富含矿物质的部分, 可用作功能性食品成分。又如 Macharia-Mutie C. W 等研究⁽⁸⁾含苋的玉米粥对肯尼亚儿童缺铁状态有益等。

至于在籽粒苋作饲料产业开发上, 国外多以苋叶粉取代鱼粉作蛋白饲料。例如 Molina. E 等 (2018) 研究⁽⁹⁾了添加苋粉对育肥兔胴体品质和肉质的影响, 认为有一种苋 (*A. dubius*) 可以作为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广泛分布的兔子饲料的替代饲料。又如 Ngugi. C. C 等 (2017) 研究⁽¹⁰⁾了苋叶蛋白浓缩物营养品质的表征及对尼罗罗非鱼饲料中鱼粉替代的适应性, 证明可用绿穗苋叶蛋白浓缩物替代高达 80% 的鱼粉而不影响尼罗罗非鱼的性能等。

四、籽粒苋作为适应气候变化与改善逆境的资源作物开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按 Bressani R. (2018) 研究⁽¹¹⁾: 对于籽粒苋是一种在过去的阿兰特克人、玛雅人和印加人文明中非常受欢迎的粮食, 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作物取决于几个重要事实, 例如它可以种植在世界上许多地区, 产量相对较高, 它耐受干旱、高温和害虫, 它是一种很好的太阳能转换器, 因为它具有 C4 代谢, 它可能是一种多用途作物以及苋籽蛋白质对谷物和其它蛋白质来源有互补效应。又据其它有关报道认为: 在成千上万的食用植物中, 只有三种谷物—玉米、小麦和大米是全世界大多数人的主要食物来源, 虽然这些作物提供了大量热量, 但它们的蛋白质和其它必需营养素含量很低, 由于缺乏遗传基础, 仅依赖几种作物导致现代种植系统极易受到预测的气候变化和伴随的极端天气的影响。扩大我们的食物来源有助于减轻环境变化的影响并改善粮食质量安全。又有人说籽粒苋是一种未被充分利用的“假性谷物”, 因其平衡的氨基酸和微量营养素特征值得关注。今后应实施新的育种技术, 这些措施将可改善未来种植系统的营养质量和气候适应能力。因此, 为改善未来种植系统的营养品质和气候变化适应能力问题, 加强谷物多样性研发已提到了时代的日程, 籽粒苋也许将在这方面是重要资源材料之一。

五、结语

1、我国首先将籽粒苋整株制作优质青贮饲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科技智库时代”的产物, 其模式是企业与科技相结合“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的一种创新模式。虽然以上例举的 4 种模式还仅是一种松散的合作, 尚未达到联盟, 但已在生态、经济、社会三效益上有明显表露, 说明了拥有同一中国梦的科技人员与企业家的合作可释放更大的多种效率潜势。

2、国外主要将籽粒苋的籽实制作营养食品, 近年来向健康功能食品方面开发。其对潜在的人类健康有裨益, 又是一个罕见的多功能种质资源, 我国今后对其向多产业综合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3、为了粮食安全需求, 世界农学界正致力于寻找与培育适应气候变化的多样性的“未来粮食作物”, 籽粒苋是可供选择的应激作物之一, 它不仅对极端气候变化有一定的灾后复生能力, 而且以其特有的抗逆性能可作为低产地, 复垦地等的先锋作物加以利用。

4、籽粒苋的播种量低, 由于种子细小, 每亩播种量只需 10-50 克。本文证实将其运用生态农业理念与生

态工程技术来加以播种可以迅速绿化大地，而在一定条件下可与生态文明建设接轨。它的快速生长能力与强大根系可促使土壤改良从而具有促进生态系统向可持续方面发展的功效。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2019年3月26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厅)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卢继传

副 主 编：辛 梅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3366 59195293

010-66117652 57206299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